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的变迁

——从改革工具到“第四权力”*

贾乐蓉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与传媒互动的角度梳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变迁的过程，展示了传媒体制变迁与改革进程之间的高度契合性。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开始之初，苏联传媒是改革的工具，在这一时期结束之时，它成了“第四权力”。根源在于，在此期间苏联传媒所依托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 传媒体制 改革工具 第四权力

【作者简介】 贾乐蓉，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历来为我国学术界高度关注，但是，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新闻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开性”对新闻媒体内容的影响或者新闻业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方面。本文试图从传媒体制变迁的角度，借鉴中俄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传媒业进行考察。

一 传媒体制的内涵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联传媒体制

与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相比，传媒体制（又称新闻体制或新闻制度）“是亚层次的制度实体，是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①。因此，不同制度下的传媒体制必然是有差异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新闻体制直接决定着其新闻业的整体结构方式和运作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 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方式”^①，具体来说，“不同的新闻体制意味着媒介所有权的不同，意味着新闻传播方针、宗旨、功能等的区别，意味着媒介管理、经营方式的差异。”^②

因此，传媒体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具体涉及传媒的所有制、职能、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并体现在传媒结构中。

据此定义，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之前的苏联传媒体制的特点是：

其一，在所有制方面，全部传媒属于国家所有。

其二，在职能方面，“传媒不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它完成的是更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教育机构的职能”^③。在苏联的新闻教科书中，有“大众信息与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简称：СМИП）的概念^④。这一概念表明，对于苏联大众传媒来说，除了提供信息，宣传也是其重要职能。但在实践中，传媒的宣传功能较之信息功能更为重要。

其三，在传媒经济方面，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传媒的经济活动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无须考虑市场和盈利，不存在商业动机。

其四，在对传媒的管理方面，苏联传媒是整个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完全听命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国家“以保密的名义实行新闻检查”^⑤，主要的审查机构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保卫报刊国家机密管理局。

其五，在传媒结构方面，表现为“严格的意识形态化和等级制”^⑥。苏联传媒具有金字塔结构，在它的顶部是中央级报纸，首先是党报，以及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塔斯社、新闻社，在底部则是大量地方报纸和企业出版物^⑦。其中，苏联的中央党报起着为舆论定调的作用。

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起，这种传媒体制开始发生变化。苏联传媒体制的变迁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年3月11日至1991年12月25日）大体重合。当然，若细致考察起来，这种重合并非严丝合缝。例如，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伊万尼茨基教授认为，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日后戈尔巴乔夫在上任初期所启动的那些改革了。当时，安德罗波夫就看重大众传媒对于改革的意义与

①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② 同上。

③ Варганова Е. Л.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МИ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 : Медиамир, 2013. С. 55.

④ Там же. С. 51.

⑤ 陈力丹、钱婕：《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⑥ Варганова Е. Л.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МИ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 54.

⑦ Там же. С. 51.

作用，并在其执政过程中把新闻界当作改革的伙伴^①。这说明，新的传媒体制的酝酿要稍早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是，由于安德罗波夫在位时间较短，因此，当时的苏联传媒体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为配合安德罗波夫推行的改革，进行过相关的批评报道。此外，新的传媒体制的确立也早于戈尔巴乔夫执政结束之时——1990年8月1日，伴随着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生效，新的传媒体制的框架大体确立。此后，尽管又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以及苏联解体，但是，这个体制的框架被保留下来。主要标志就是，1991年12月27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起草者与苏联新闻法的起草者相同，它的内容也是对苏联新闻法的继承。因此，从总体上看，苏联传媒体制的转换主要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从政治与传媒互动的角度来阐述这一变迁过程。

二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1985～1987年）传媒业的变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针对苏联社会长期停滞、经济陷入低迷的状况，在1985年4月的苏共四中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战略”，其目的是要发挥“社会主义潜力”，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由于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领导层无法自觉地选择改革之路，因此，为了给改革提供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冲破党内保守派的抵制，在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公开性”原则。就其本意来说，“公开性”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②。

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与此前苏联领导人的不同——戈尔巴乔夫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看重民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关于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是：要解决经济危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就需要发展民主，调动每个公民的积极性，而这需要公开性，而公开性又依赖于媒体^③。于是，苏联传媒就这样被推上了政治的前台。

为了确保对改革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任命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后

^① 伊万尼茨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2010. С. 117.

^②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③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М.: ЮНИТИ - ДАНА, 2011. С. 234.

来任中央书记)、他的自由主义盟友、被称为“公开性之父”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承担贯彻公开化的任务。雅科夫列夫“邀请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编辑来运作新闻报刊,诸如《莫斯科新闻》《星火》和《共产主义(者)》”^①。除此之外,1986~1987年间,其他一些中央级出版物,如《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论据与事实》《苏联文化》《旗帜》等的主编也都换成了支持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②。其中,“公开性”的领头羊是《莫斯科新闻》和《星火》杂志。

由于有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一些胆大的专栏作家,尤其是《莫斯科新闻》的专栏作家,开始讨论当前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此外,它还“开始对过去的苏联共产党弊政展开最直率的批评,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予最大力的支持”^③。而《星火》则从一复刊就关注历史问题,刊登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并鼓励批判性思维^④。这与改革之前苏联新闻界一味粉饰太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伊万尼茨基认为,正是根据雅科夫列夫的倡议并在他的积极支持下,苏联的一些媒体被赋予了尖锐地、贸然地批评苏共的权利^⑤。

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中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新的改革口号——“多一些民主”和“消除历史空白点”。此外,在关于外交政策的探索与讨论中,自1987年起正式提出“新思维”,其主旨是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抛弃了“斯大林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⑥,开始“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⑦。尽管这一理论创新始于外交领域,但很快便与国内改革联系起来。“对总书记而言,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给国内改革赢得喘息机会的工具,也是变革的手段。”^⑧就其本质而言,“戈尔巴乔夫开始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

①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②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41.;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70页。

③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47、69页。

④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41.;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69页。

⑤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2010. С. 124.

⑥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页。

⑦ 同上,第392页。

⑧ 同上,第385页。

正地对外开放。”^①

这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出台自然得到了媒体的配合。在此过程中，“全人类价值观”、“自由经济价值”、“自由的世界观”等概念也开始进入苏联社会中^②，苏联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了。

这一时期的苏联媒体一方面作为改革的工具，为宣传苏共中央的各种改革措施助力；另一方面，在变化了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苏联新闻界自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传媒的报道内容更加广泛、大胆。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已故教授奥夫塞班认为，“（在苏联的生活中）恢复了真实性和公开性。……许多长期被禁止的话题，现在成了广泛讨论的对象。”^③例如，“在报纸和杂志上、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反映了充满成就和矛盾的现实生活，以及多样化的各种观点和意见。”^④苏联传媒揭露了拥有特权的权贵阶层，揭露了官员们长久不愿意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许多报纸中出现了关于不公平的奖金分配、军队中的潜规则、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材料^⑤。

在“消除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档案被不断揭秘。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揭秘，是从对斯大林的批判开始的。尤其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大清洗，受到了媒体的揭露和指责。此后，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高层领导人也陆续遭到了新闻媒体的揭露和批判。

（二）独立出版物由地下转入地上

“独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社会中出现的、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符的非法出版物。随着“公开性”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此前在苏联社会中曾处于地下状态的独立出版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的数量急剧增多，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独立精神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

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方针的第一年，社会上就出现了第一批非

①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第416页。

②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С. 122.

③ Овсян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2005. С. 232.

④ Там же. С. 215.

⑤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50.

法出版的独立报纸，其中有《公开性》《水星》和《公社》等等^①。资料显示，到1988年8月，苏联共出版了64种独立出版物，它们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波罗的海及乌拉尔等地。随着独立出版物数量的不断增多，它们的政治倾向也变得日益多样化：既有主张民主自由思想的，也有宣传基督教精神的，更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②。

（三）国家放松了对大众传媒的监控力度，传媒的自主性增多

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逐渐放松了对新闻媒体的监控力度。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的审查。除国家和军事机密外，其他一切内容均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机构的总编辑自行处理。根据伊万尼茨基的看法，到1988年前，苏联传媒的编辑们已经取得了创作独立性，新闻检查已大大弱化，党委倾向于不干涉“公开性”政策^③。其次，赋予了新闻媒体更多的人事自主权。1987年，《星火》周刊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上任后曾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减少对报刊人事权的控制，认为报纸的总编应当有权解雇或聘请报社工作人员。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了苏共中央的重视。同年，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作出决定，改变了以前由党和国家确定报刊编辑人员定额的传统，宣布全国各报刊工作人员的人数，除主要负责人（如总编、副总编、区报的责任秘书等）外，可由报刊总编根据需要自行确定。第三，减少了对国外媒体的限制。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的提出和冷战趋于缓和，苏联政府从1987年起停止了长期干扰外国广播电台的做法，苏联居民可以自由收听BBC、“美国之音”以及“德国之声”等西方电台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国外电影和音乐的录像带或磁带。

由于苏联人民长达几十年的“信息饥渴”第一次得到了满足，因此，苏联大众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喉舌和形成社会舆论的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威望^④。据民调统计，这一时期大众传媒在民众中的信任度高达80%以上^⑤。一方面，“来自

① Овся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Февраль 1917 – 90 – е гг.) .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1999. С. 200.

② Там же. С. 201.

③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С. 146.

④ Есин Б. И., Кузнецов И. В. Триста лет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1702 – 2002) .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 35.

⑤ Коновченко С. В. Общество –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 власть. Ростов – на – Дону: СКАГС. 2001. С. 89.

普通公民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信件和反馈急剧增多”^①，另一方面，报刊的发行量和种类也不断上升^②。

然而，尽管有了以上种种变化，但在当时的正式文件中，例如，在1985年苏共中央的四中全会、党的十七大、全苏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中，都坚持党对于大众传媒的集中领导的路线是不可动摇的^③。并且，即使是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实际上坚决要求媒体的编辑支持自己的政治方针”^④。这从《真理报》前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来，戈尔巴乔夫夫人虽然为公开性、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开了“绿灯”，但也正是他本人多次对报纸直接发指示，有时还因为报纸上不合他心意的报道而向报社兴师问罪^⑤。

因此，奥夫塞班教授认为，“广泛宣扬的公开性只是宣称而已，它实际上不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其中也包括报刊与党的机关的相互关系。”^⑥

换句话说，这一时期，虽然苏共放松了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但大众传媒仍然要接受苏共的领导。这说明，苏联媒体与苏共的关系仍然停留在旧有的框架内。苏共领导人也仍然像此前的几十年一样，把传媒当作工具来对待。只不过，这一次是把传媒当作改革的工具来对待。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扎苏尔斯基教授认为，此时的苏联传媒是社会民主化的工具，同时仍然处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管理之下^⑦。

三 关键的1988年：苏共高层关于舆论问题的 公开分歧以及苏联改革的转向

经过三年多的改革，到1988年前后，苏联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已经发生

①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50 – 251.

② 从1985年到1988年，苏联报纸和杂志平均每年发行量增加大约2 000万份。其中1987年，《真理报》的发行量为1 1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的发行量为1 700万份，《劳动报》的发行量为1 800万份。到1989年，苏联国内共有报纸8 800种，其发行量为2.3亿多份；共有杂志1 629种，其发行量为2.2亿多份。参见：Овсе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февраль 1917 – 90 – е г.). С. 192.

③ Овсе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 215.

④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300.

⑤ [俄]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165，172页。

⑥ Овсе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 215.

⑦ 转引自：Варганова Е. Л.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МИ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 : Медиамир, 2013. С. 58.

了明显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满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85年3月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解放了人们的公共意识、视野和思维行动。人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关注人民和公民正常和有尊严地发展的可能性。民主改革发自内心的内心，不可能被压制和禁止。”^①

但传媒问题在苏共高层越来越多地引发争议。

一些持保守派立场的政治局委员，例如利加乔夫，“一直强调对‘揭示家丑’的出版物如《星火》和《莫斯科新闻》的控制要更加严格，这些出版物以暴露斯大林的过错为专长，公开刊登一些自然灾害的情况，公开呼吁人们注意党的不合理的特权”^②，但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已经将改革作为一个民主革新的进程，我们必须确保改革的实行也采取民主的方式。”^③

分歧围绕着1988年3月列宁格勒大学一位女教师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来信而公开化了。1988年3月13日，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和雅科夫列夫访问蒙古期间，列宁格勒大学教师妮娜·安德列耶娃的来信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题目是《我不能放弃原则》。

在这封来信中，作者“反对大众传媒不加区分地给整个苏维埃历史抹黑”^④。并且，“据称这封信是在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的鼓励下及其工作班子的协助下写成的，它号召结束戈尔巴乔夫激进的、破坏稳定的改革政策。”^⑤文章发表后，中央机关还指示各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

这件事给戈尔巴乔夫以很大的震动。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因此在这样的报纸上发表类似的来信“就等于是对我制定和经过二月全会批准的路线的直接挑战”^⑥。

为此，在经过两天激烈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后，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安德列耶娃的来信，重申支持新闻自由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79页。

②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21页。

④ [俄]B. A. 利西奇金、Л.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35页。

⑤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71页。利加乔夫本人否定了这种说法。

⑥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75页。

和独立的立场^①。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把安德列耶娃的信宣布为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书^②。此后,《真理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安德列耶娃的文章。

这一事件无疑给当时已经沸腾的舆论自由化开了绿灯,同时也成为苏共高层围绕改革路线发生公开分歧的开始。

在社会舆论如火如荼之时,苏联的改革也出了问题。

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便开始实施的“加速战略”和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都不成功,反而使国内经济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党内保守势力的抵制。他认为,如果不实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就无法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此,他认为,应当“将国家从党的手里解放出来”^③。

于是,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其主要内容是:“革新国家权力结构、把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会议通过决议,把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成立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④由此,苏联改革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四 1989年的政治改革启动之后: 传媒致力于成为“第四权力”^⑤

如果说,改革之初,“党允许媒体批判国家的过去,但必须要保护它的现在”^⑥,因此,有许多题目是新闻媒体所不能碰触的,例如,列宁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但是,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启动和社会更加激进化,媒体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本人。关于这一点,奥夫塞班教授在《新本国新闻事业史》一书中有如下表述:

①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73~74页。

② [俄] B. A. 利西奇金、Л.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235页。

③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第48页。

④ 陆南泉等:《俄罗斯国家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⑤ “第四权力”是西方民主国家关于大众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比喻,意指媒体是相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代表了来自社会的声音和力量,使公民可以通过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是对其权力的制衡,可以更好地实现民主。19世纪以来,这一理念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非常普及,但同时它也遭到了众多质疑。

⑥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57.

“长期以来，列宁本人的题目是不可碰触的。甚至当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时，还删除了批评列宁的部分。但只过了一年，在公开性和新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下，在报刊中开始出现大量文件，揭穿了关于仁爱的列宁、关心备至的‘人民之父’斯大林、善良的‘全苏班长’加里宁、‘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杰出的’苏联外交家莫洛托夫，以及所有参与了镇压和迫害上百万古拉格囚徒的斯大林周围的人的神话。”^①

同时，在报刊上恢复了布尔什维克从掌权之初起就残酷地对待有产阶级、沙皇家庭、神职人员、哥萨克以及在国内战争中红军使用死刑、迫害和大规模镇压异见的真相^②。在《消息报》《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真理报》《新世界》《星火》和其他出版物上的“历史教训”“历史之页”“透过岁月”等专栏也刊文再现了十月革命期间的历史真相^③。在苏联的历史编纂学和报刊中第一次试图客观地评价白军军事领导人和不接受十月革命的各政党领袖^④。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苏共历史的彻底重估，由此开启了破坏苏共权威的过程。

对于此时的苏联传媒来说，“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发生了作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工具的大众传媒的内容的快速突变。大众传媒越来越积极地批判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赞成在国内引入私有制和市场关系，为失业辩护，建议重新考察苏共与苏联的历史，等等。”^⑤ 80年代末，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丑恶的”“反人类的”和“应当消灭的”^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召开，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半民主的方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播的代表大会。这场覆盖范围极大的直播自然“在苏联社会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⑦ 直播向苏联民众展现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着的许多问题。“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斯大林的罪行、

① Овсепян Р. П. 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 241.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Андрей Рихтер, "Свобода печати" и "Гласность" в СССР. //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 Н. Засурского и О. М.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ой. Гласность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1985 - 200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оц. - экон.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 (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 Фак.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М., 2006. С. 98.

⑥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С. 110.

⑦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08~109页。

军工企业对经济发展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改革的失败、贪污腐败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代表们畅所欲言和激烈争论的话题。波罗的海诸国要求独立。一些代表指责共产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持会议的主席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发表讲话和作出劝告，但还是允许在争论中有较大的自由。”^①

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实际上开始实行议会制了。但是，苏联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党国国家，党的弱化会自动导致国家的瘫痪和灭亡^②。我们同意《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作者的观点：“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性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把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③

当时苏联的情况正是如此。按照新的政治竞争原则形成的新的政治行为体和组织对苏共的权力形成挑战，与此同时，“在党的高层，改革的反对派和倡导者开始公开宣布各自的政治立场”^④。

在苏共控制社会的能力急剧下降的背景下，苏联媒体基本上处于为所欲为的状态。尽管此时的苏联媒体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也仍然接受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但它们在言论及报道方面已经不再与苏共中央机构保持一致。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89年夏天苏联的产煤区（顿巴斯、库兹巴斯、沃尔库达）罢工期间。当时，这一地区“被大规模数月来未得到工资的矿工罢工所席卷。中央媒体积极地报道了这些事件，批评官员处理事件慢。政权机关试图使居民相信问题只是暂时的，但许多媒体强调了冲突性的增长，并预见未来还会发生更大的社会动荡。”^⑤

这一现象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所有反对现存制度的声音都是从接受国家财政拨款的主流媒体上发出来的，这与其他社会中的反对派媒体通常处于边缘地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由于苏联主流媒体的覆盖范围极其广

①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08页。

② Ненашев М. Ф. Иллюзии свободы.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 эпоху перемен (1985 – 2009) . М. : Логос, 2010. С. 16.

③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03页。

④ 同上，第66页。

⑤ Стровский Д. Л.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новейшего периода. С. 246.

泛，因此，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绝非边缘媒体所能比拟。

许多研究者认为，1989年到1990年之间的苏联媒体是最自由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苏联媒体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和自由。并且，它们还同时拥有国家的经济支持，没有经济压力。尽管苏共高层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时而借助于训斥表达对媒体的不满，例如，伊万尼茨基在其专著《新闻业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主要的管理大众信息与宣传工具的‘手段’是戈尔巴乔夫对《论据与事实》《苏维埃俄罗斯报》《星火》《莫斯科新闻》主编以及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领导人的‘训斥’”^①，但这种训斥在实践中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在此背景下，苏联传媒界发出了要成为“第四权力”的呼声，目的是使苏联大众传媒的独立地位合法化，完全摆脱苏共对新闻媒体的控制^②。与此同时，觊觎政权的俄罗斯民主派也看到了媒体对于其与苏共争夺权力的重要作用而呼吁使媒体的权利从法律上得到保障。于是，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启动了^③。

五 1990年：新闻法的通过与新的传媒体制的形成

1990年6月12日通过、1990年8月1日生效的《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成文的新闻法。这部法律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第一次取消了新闻检查、并给予除国家、国家机关和苏联共产党以外的各种主体以创办大众传媒的自由。它的第4条规定，传媒编辑部是根据章程运作的法人，尽管这与苏联民法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以及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法律相抵触^④，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本就没有法治文化，再加上当时混乱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大批苏联媒体迅速根据这一法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以法人身份进行了重新登记，从而脱离了苏共的控制^⑤。除了已有的媒体，根据这部法律，还开始了创办新的大众传媒的过程。

伴随着新闻法的出台，苏联高度集权的新闻体制瓦解了。到1990年通过新闻法后，一种新的传媒体制形成了，它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С. 126.

② [俄]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③ 关于这一法律出台的背景，可参见拙文《苏联新闻法立法背景考察》，载《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2期。

④ Иваницкий В. 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тюд. С. 129.

⑤ Там же. С. 129.

其一，从传媒所有制来看，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其二，从传媒的职能来看，大众传媒不再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们成了独立的社会机构。

其三，在传媒经济方面，由于当时市场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因此一些经济后果在通过法律之时尚不明显，但之后不久，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市场的威力开始显现，这是后话。

其四，从对传媒的调控来看，实现了由党的行政调控向法律调控的转变。尽管在当时混乱的社会条件下和苏联人淡薄的法治意识之下，真正的法律调控实际上很难实现，但毕竟是拥有了形式上的法律。

其五，在传媒结构方面，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被打破，由市场决定的平行结构开始形成。

因此，扎苏尔斯基教授把通过新闻法后的苏联（后来是俄罗斯）传媒模式概括为“第四权力”模式^①。他认为，这一时期，在俄罗斯发展起了一种新型的新闻事业，它的基础是多元主义和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②。尽管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中，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而被大大削弱了^③，但在当时，称这种传媒模式为“第四权力”模式是恰当的，因为此时的传媒是独立于政府的，并且，起到了对政权进行监督的作用。

新闻法通过后，苏联社会处于持续剧烈的变动中，以至于最终发生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解体。“八一九”事件后的8月25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在俄罗斯境内取缔苏联共产党的法令，没收了苏共的大部分财产，并且暂停了一些共产党报纸的出版，这更加速了传媒所有制转变的过程。但此前确立的传媒体制的框架并未改变。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三天，1991年12月27日，俄罗斯联邦以苏联新闻法为基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它与苏联新闻法之间具有继承关系。

^① Засурский Я. Н. Введение. Десять лет свободы печати в Росси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М. :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2. С. 5.

^② Засурский Я. Н. Тенденци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М., 2005. С. 9.

^③ 由于市场改革所引起的纸张价格和发行费用放开，导致报刊的发行成本上涨，以至于许多报刊的发行量急剧下降。对于大多数媒体而言，由于不能承担生产和运输支出，法律给予的独立性成了形式上的，甚至广告也不能保障许多出版社的财政独立性，更何况当时广告市场尚未形成。

结 论

考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的变迁,我们认为,这一变迁过程折射出了苏联社会的剧变,显示出了它与苏联改革进程的高度契合性。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初期,其初衷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为此目的,得到党内改革派授意和支持的苏联传媒起到了“动员改革的支持者(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以及暴露和打击那些公开反对改革的行为和群体”^①的作用,它们较之以往更加大胆地发言,是改革的积极宣传者和支持者,但尽管如此,苏联传媒仍然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运作。但伴随“新思维”的出台以及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苏联传媒也从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转向了反对改革、反对社会主义。1989年政治改革启动之后,由于苏共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苏联传媒实际上处于不受管控的环境之中,而新闻法的通过则标志着传媒体制转变过程的完成。

由于在此时程中,苏联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传媒体制也改变了——改革开始之初的作为改革工具的传媒转变成了“第四权力”。因此,这一时期的传媒体制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一方面,它自苏联传媒体制发展演变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新独立国家的传媒体制继续发展变化的起点。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美]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